

银行家们正在进入高风险期

——三十五评发展实体经济

■ 李锦

是趁火打劫、继续榨干企业的血,还是适当收敛、“哺乳”实业?后者无疑是正确的选择。然而,中国的银行家们没有一个愿意这么做的,因为对于暴利的贪婪性决定他们不可能这么做。尽管中央政府喊破嗓子,他们甚至连样子也不肯做。

正因为如此,如同垄断性央企近年来遭遇的铺天盖地的公众批判一样,近年来中国银行业所享受的庞大的制度保护和垄断红利,使其置于被批判的风口浪尖。银行业暴利风波再一次把商业银行拉入高风险期。

贪婪暴利的道德风险

2011年,商业银行非银行利息不到20%,换句话说,也就是银行利润的80%以上来自利息差。目前,我国一年的存款利率上限仅为3.5%,而贷款利率为6.56%,利差为3个百分点。只要有存款、有放贷,银行想不赚钱都很难。如果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,银行的利差不会达到3%,资本回报率也不会动辄超过30%。然而今日中国银行业的事实便是如此。早已有人指出:银行业

暴利是因其双向垄断的结果。作为排他性存款机构,有动机和能力压低存款利率掠夺存款人;作为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的贷款人,国有商业银行有动机和能力提高贷款利率掠夺借款人。因而中国的存贷款利率差,是在自然生态中,居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已经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 系,那么金融生态顶端的银行是否也应重新审视实体经济的状态呢?

避免竭泽而渔,不光是说自然界,对于金融生态也同样适用。如果企业都倒闭了,银行还可能生存吗?

虚拟经济的生存风险

银行业的事实垄断造成中国实体经济的水池越来越浅,严重阻碍中国科技进步和老百姓创业。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,中国银行业暴利,2011年中国地产业泡沫造成实体经济危机,银行业照样暴利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所以任何一个危机必须要倒掉一批企业,倒掉一批银行,不然后患难料。一些放高利贷的银行工作人员和权利业者,一直在赚取海量的暴利,使得受惩罚的永远是实体经济。

银行盈利的来源是实体经济,中小企业在完成自身蜕变的同时,也是行业优胜劣汰的过程,也许有的行业活了下来,而有的则永远消失。与自然生态相似,金融也是一个弱肉强食、适者生存的生态环境,但是在自然生态中,居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已经开始反省人与自然的关 系,那么金融生态顶端的银行是否也应重新审视实体经济的状态呢?

避免竭泽而渔,不光是说自然界,对于金融生态也同样适用。如果企业都倒闭了,银行还可能生存吗?

“高利差”的舆论风险

现在,公众对银行暴利投以审视以至批判的眼光。从2010年起,随着通货膨胀重新抬头,央行加息的步伐又远远滞后于实际利率水平,中国经济随之进入又一个“负利率”时代,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.5%,而2011年全年的通胀率至少在5%以上,居民储蓄存款一直维持在2%以上的负利率状态,通胀之下,“跑得快刘翔,但跑不赢CPI”成为公众的普遍焦虑。畸高利润也被外界批评为“是以牺牲和剥夺储户和存款人利益为前提的”。

高利差保护实质上是对存款人

征税,以此补贴银行业的一种政策。

从2007年开始,呼吁取消存贷款高利差政策的声音就不绝于耳,但实质性的改革迟迟未能推进;而进入2009年,随着新一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,这一强化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垄断性制度保护,摇身一变,成为“四万亿”刺激政策之下,中国银行业非理性扩张的利器。令人遗憾的是,刚刚结束的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,“推进利率市场化”的提议并未出现在最终报告中。银行业的舆论风险正在排山倒海式的卷来。

国际竞争的弱化风险

金融危机以来,欧美银行体系式微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难得的时间窗口,中国银行业本应抓住机会,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,尽早在公司治理、业务创新和国际化能力建设方面拿出实质性改革举措;稳步提升对国内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回报和服务品质;进而以现有市场主体为基础,培育出一批能在国际市场上比肩跨国金融资本的种子选手。可是,国内银行业在改制上市后并没有启动太多实质性的内部改革,而是充分利用

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迟滞尽享政策红利,蜕变成超级“印钞机”,造成国内银行业普遍存在的利润畸高局面。

目前,欧美同行陷入困境,正是中国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体系的银行家们,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,画出契合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清晰路线图的时候。否则,一旦欧美同行恢复元气,运气恐怕再难眷顾中国银行业了。

“分配腐败”的政治风险

银行业经理乃至每个员工的高薪已被广泛关注。金融企业“分配腐败”是经济转型时期的现象。如果我们忽视它,它就像一颗依附于体制的“毒瘤”,慢慢地侵蚀它的机体。首先,从经济体系的环境——社会来看,“分配腐败”破坏了社会公平准则,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。金融垄断企业利用公众给予它们的强势地位,将企业福利的成本转嫁于社会,这和“劫贫济富”没什么两样,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,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。

其次,金融“分配腐败”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流失。“分配腐败”最大、最明显的危害在于把国有资产、

税收等全民财富以福利的名义转为个人财富。

最后,从微观的经济个体——金融企业来看,“分配腐败”、“福利腐败”表面看是垄断企业本身得利,但实质上它们是在扼杀自身的活力,无异于“慢性自杀”。一个不断将经营成本提高的企业,其市场竞争力也必然不断削弱,在垄断状态下,它可以转嫁给国家,一旦打破垄断,进入市场竞争状态,又将如何自存呢?

目前,中国银行家面临的不仅有舆论风险、竞争风险、腐败风险、道德风险,而且将面临生存风险。这种风险不仅是来自内部,还来自外部。怎样消除风险?前不久,温家宝总理撰文强调: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。金融发展的根基是实体经济,离开了实体经济,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各类金融机构都必须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思想,全面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水平,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共生共荣。

银行家们是被动地接受风险,加剧困境,还是主动地化解风险?全看他们自己了。

(作者系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)

愿闻温州人收购中国的银行

——三十六评发展实体经济

■ 李思贤

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于24日至25日在河南省考察金融工作时表示,要促进中小金融机构健康发展,努力破解“三农”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,鼓励、引导和规范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,不断发展和完善“草根金融”。

在2月1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,温家宝总理再一次强调,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领域。近年来这样内容的讲话很多,只是最近较为集中而已。

不久前,温州商人林春平6000万美元买下大西洋银行,后来更名为新汇丰银行。据说,先前这家银行价值4亿美元。这则新闻很有价值,不过不是发生在中国,而是发生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。

林春平只花了6000万美元就当上了银行家。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在中国发生的只能像吴英那样偷偷摸摸的非法集资者。

温州人是很聪明的,他们早就有办银行的想法。在此前的10年,温州民间资本在内向国务院申办成立华侨银行,在外选择意大利尝试成立欧联华人银行,均告失利。为了当上银行家,不少人非法揽储

甚至办起了“地下钱庄”。

这个林春平在温州有没有想过办钱庄,不得而知。其实,林春平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只花了6000万美元,这并不算是天文数字。就在温州,拥有这种资金实力的老板也不乏其人。为了让手中的钱增值,温州的商人炒房、炒股、炒黄金,甚至违法经营地下钱庄。据专家估算,仅温州“地下钱庄”的经营规模就数以千亿计。而这个林春平不似吴英等人愚笨,终于越过太平洋做起“桶生淮南则为橘”的美事。

其实,中国这块土地是非常需要民间银行的。民企有大量的资本缺乏投资的渠道,大量的小微企业融资困难。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,政府一再要求国有控股的大银行在信贷上向小微企业倾斜,但由于向民营小微企业的贷款效率低、风险大,政策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。而如果有“门当户对”的民营中小银行,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

虽然2005年“非公经济36条”以及2010年的“新36条”等很多中央文件都明确提出鼓励、引导、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等行业,但由于缺乏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,限制的条件太多,从而形成“玻璃门”

现象,使得林春平在中国办不起银行来。

其实,中国土地上并不缺少办银行的,比如银行央企、地方政府、地方国资等形形色色的垄断资本和产业资本。2010年3月,中国移动以398亿元收购浦发银行22%新股,成为浦发第二大股东,堪称其中的杰作。

无独有偶,一批制造业央企以及当地的政府投资平台,纷纷大手笔入股城商行。2011年底,大唐集团斥资14.1亿入股富滇银行,成为富滇银行并列第一大股东。

大家现在都知道银行是个金娃娃。地方政府也想设法要攥在自己手里,一些实业企业也想把自个作为产业金融混合发展的跳板。只是政策上不支持民间办银行而已。

国务院日前表示,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、金融、市政等关键领域。其中,金融领域更是吸引了民间资本的注意力。对于各地方政府,一方面存在支持发展民间融资、盘活当地民营经济的意愿;另一方面又担心由此滋生金融风险,难以控制。在此矛盾之间,民间银行便不让办了,只是小额贷款之类的假银行罢了。

去年年中,温州爆发民间融资

难题,实际上是民间资本的金融投资渠道不畅引发的,集中反映了当前我国民间资本的“堰塞湖”难题。“温州事件的爆发反映出,如何疏通民间资本,发挥民间资本服务经济的作用,已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放宽民资进入垄断领域,不仅可以疏导当前汹涌澎湃而又没有投资方向的巨大民间资金,避免这些民间资金横冲直撞、惹是生非,又可以逐步打破垄断领域,尝试性推动垄断行业改革。鼓励民间银行出现,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。

现在,林春平终于“破冰”了,但却是在国外破的冰,是拿中国人的钱为美国人服务。这是林春平本人所不情愿的,也是其他国人所不乐见的。如果这种做法更多地被复制,还会造成国内资本的大量外流。那么,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局面?当然是进一步开放国内的金融业,让民间资本家在国内实现做银行家的梦想。

温州商人收购美国银行也许能倒逼着国内金融业打破垄断。“非公经济新36条”的实施细则可望在今年上半年出台,不知道能不能把民间银行这一条写进去。也许,更像林春平这样的民间银行家能在国内涌现。

矿产品资源税的调整能否缓一缓

——三十七评发展实体经济

■ 任东晓

日前,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悄然下发了《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的通知》,决定自2012年2月1日起,对锡矿石、钨矿石、菱镁矿、滑石、硼矿、铁矿石等六种矿产品资源税适用税率标准进行调整。本次调整中,锡矿石资源税率的提高幅度最高,较原先提高了20倍。铁矿石的规定税率也由最初的60%上调至80%,其余钨矿、菱镁矿、滑石、硼矿等都有不同幅度的提高。

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,表明国家将进一步推动资源税改革;这是一个消极的信号,表明资源类相关行业将承受更大的经营成本压力。

诚然,国家提高资源税税率的本意是好的。旨在更好地发挥税收调节功能,避免属于国家所有的稀缺性资源利益的流失,保护生态环境。但是,不得不说的是,改革的时机欠妥当。

前面笼罩实业的阴霾还没有散去,政府呼吁“回归实业”的余音还萦绕耳边,后面紧接着下达了提高资源税税率的通知,这无疑给企业当头一击。锡业股份2月22日发布临时公告称,受财政部、国税总局关于调整锡矿石等资源税的影响,企业今年生产成本新增约5000万元。测算进一步显示,扣除所得税后,对净利润影响约4845万元,折合每股收益0.046元。

当前多数人认为,基于原有基数较低,上调后的开采成本不足以影响大型冶炼企业的生产经营。然而,必须认识到,对于小规模的山矿企业以及钢铁行业,此次税率上调势必会导致其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。

以钢铁业为例。据中钢协内部消息透露,2011年9月份77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有9家亏损,10月份增至25家亏损,亏损面扩大至32.5%,而11月份亏损面进一步扩大至约37%的水平。中钢协会员钢铁企业2011年11月份若扣除投资

收益,净亏损约为9.2亿元。

全行业利润降至“冰点”,寒冬来临的背后很大原因是高成本的制约,其中铁矿石涨价因素不容小觑。此番资源税税率的提升,无疑进一步加大了铁矿石的开采成本,企业只能通过提高销售价格,将成本损失额转嫁到消费者身上。为何铁矿石价格长期居高不下、坚不可摧?除去其背后少数企业垄断因素所致,另一原因就在于高成本。

有人认为,既然国内开采成本高,何不直接到国外进口。的确,降低部分进口商品关税,增加能源资源产品、先进设备和关键零部件产品进口属于结构性减税范畴。表面上看,这为企业进口原料提供了便利,降低了经营成本。但是进入2012年,部分铁矿石出口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,我国铁矿石进口的外围环境进一步恶化。

目前,不利于钢铁业的因素主要有两点:一是印度、越南等新兴国家不断提高铁矿石出口关税;二是还没

有起爆的“炸弹”,即尚未最终通过的澳大利亚矿产资源税法案。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于2012年年中开始向铁矿石、煤矿征收高达30%的资源税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,同时对铁矿石的进口量也是排在世界第一位,澳矿大额收税,将直接加重国内钢铁行业的成本支出,不利于钢铁业的良性发展。

外国的恶劣环境让中国企业难以冲出国门,恰逢此时内围的资源税税率又节节攀升,中国钢铁产业确实进入进退两难的局面,一些抗压弱的企业怀揣微利,势必会退出市场。

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说:“税收这种技术,就是拔最多的鹅毛,听最少的鹅叫。”当下企业的元气还未恢复,国际环境也不利于中国资源进口。政府理应出台相应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,而不是用日益加速的资源税改革将其步步紧逼。能不能够不提高税率或是缓段时间再征收?让大多数企业缓口气。

“富二代”企业家能否扛起实业报国的旗帜?

——三十八评发展实体经济

■ 任腾飞

“富二代”是一个夹杂了太多负面感情的词汇,其中包含了民众的仇富心理、不劳而获、不思进取以及恨铁不成钢等等。曾经有一项调查显示,37%的“富二代”希望自己创立一番事业;45%认为自己还不具备接班的各项素质,不愿接受父辈的事业。

对他们来说,被冠以“富二代”的名号是没有选择的,这个头衔就像一座无形的大山,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。

“不愿意做木偶,要独立!要做点成绩给他们瞧瞧!”一些兼具勤奋和胆识的“富二代”的创业者,在充满坎坷和艰辛的实业道路上,有的已经有所斩获,有的也已崭露头角。

比如HTC创始人王雪红。作为台湾经营之神、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的女儿,她是典型的“富二代”。但是,她却选择白手起家,带领HTC在高科技领域拼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对于那些继承了老一辈企业家财富与权力的“富二代”企业家们,父辈的成绩对于他们来说是挥之不去的阴影:企业运转良好,会归功于父辈的决策英明、管理团队的良好执行;企业稍微有些风吹草动,就会落下“无能”、“草包”的骂名。

久而久之,这些“富二代”企业家们实业报国之心渐冷,追求实业报国的脚步渐缓。“想做点事儿”成为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声音。

为了证明自己,他们领导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房地产、银行理财与信托投资上来,在国际经济资本化、虚拟化大潮的冲击下,这些稚嫩的肩膀,放下了实业报国这面最鲜艳的旗帜,转而追逐财富最大化。

他们迷失了方向,抛弃了以实业起家的老一辈企业家们的优良传统,转而成为追求“高风险、高回报”的投机者,在这个“钱生钱”的游戏中,病态的赌徒心理作祟,使得欲望的雪球越滚越大,就像咖啡和海洛因,让他们沉醉、沉迷、沉溺,乐此不疲。

然而,这些从事虚拟经济的“富二代”投资家们,“白天在去资本市场的路上,晚上在从资本市场归来的路上”,很少有人用赚来的钱服务和培养实体经济。

实体经济是国家应对危机之根,是国家谋划发展之本。发展实体经济对于企业来说,也是其能够在泡沫经济风浪和金融危机海啸中立得住、站得稳的根本。如果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作后盾,虚拟经济只能是为了摆脱暂时的饥饿所画的饼,看起来很美,但吹弹即破,这将对我国的长远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。

在欧债危机敲响了警钟、国家呼唤企业重归实业的大背景下,“富二代”企业家能否扛起父辈实业报国的旗帜,转而专注于实体经济?

这牵动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。

目前,中国老一辈企业家有的已经功成身退,有的也已经淡出一线的管理舞台,“富二代”企业家大范围上位的时代已经到来。但是,这支大旗对于他们稚嫩的肩膀来说,显得沉重许多,因为老一辈企业家传承的不只是财富,还有老一辈企业家的精神。

中国老一辈企业家们勤劳、坚韧,能担当,有进取心,他们为实业奋斗的动力仿佛无穷无尽。他们追求财富,却不以聚敛财富为目的;他们也尝试投资,但从不耽误自己的主业;他们白手起家,却能够经得起金融风暴的洗礼;他们历尽千辛,心中的那份坚持从未改变。

这份坚持便是实业兴国、实业报国,这份坚持源于他们那颗热忱的爱国之心,使得他们不只为自己而活着,更是为了更多的人而活,活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。

一个重大抉择摆在这些“富二代”企业家面前。

是选择继续证明自己,把追逐利润当成是终极目标,而且连追求利润的方式也是不加选择,还是先实现一个“最低目标”——建造一个健康的企业,成为一个健康的企业家。

这需要国家引导“富二代”企业家正确认识财富和人生的意义。通过营造鼓励脚踏实地、勤劳创业、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,将社会上弥漫的投机心理驱除,使他们安心发展实体经济。

在这个呼唤企业家重归实业的时代,中国乃至世界都需要“富二代”企业家扛起父辈实业报国的旗帜,这面大旗不能倒下去,这是实体经济得以发展壮大的灵魂。当他们肩负起这份责任,“富二代”这个词汇,就有了新的含义。